

第 1 章

《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命运

在自然界中，那些高耸入云的奇峰峻岭，往往是烟霭缭绕的，本来面目变得朦胧难辨。在人类认识史上，那些思想巨匠留下的传世之作，对其科学价值也往往很难一下子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因而留下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马克思《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的哲学意义，就经历着这种曲折神奇的历史命运。

1. 历史探索的曲折道路

一部《资本论》哲学意义的研究史，向人们诉说着这部马克思主义巨著神奇独特、曲折多磨的历史命运。一方面，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资本论》及其历史观的深刻思想胜利进军的历史。尽管世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风云一时的显赫人物犹如历史过客匆匆而去，多少流行一时的时髦思潮如昙花一现灰飞烟灭，而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历史观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科技革命中却犹如常青之树，生机盎然。另一方面，这 100 多年来的岁月，又是《资本论》及其历史观、方法论屡遭磨难、历尽艰辛的历

史。且不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先是企图以沉默加以抹煞，而后继之以围攻、曲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也存在着种种误解和歧义。时至今日，《资本论》的哲学意义特别是《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历史观的哲学意义，至今还研究得很不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是一个尚待开拓的处女地。

一个多世纪的《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的研究史可以看做是一个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大螺旋曲线：《资本论》问世后的头半个世纪（19世纪60—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第1阶段，后半个世纪（本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是第2阶段。

当本书谈论《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时，将侧重于历史观这一方面。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不涉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等方面，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在《资本论》中熔为一炉的。

恩格斯是《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他在这一领域的巨大历史性功绩在于：(1)他是高度评价《资本论》理论意义、哲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最先明确指出，《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批判的基础”^①。他把《资本论》称为“划时代的著作”，认为从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2)他高度评价了《资本论》中辩证方法的巨大哲学意义。他指出，《资本论》创作中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②。他的《自然辩证法》手稿是一部未能完成的传世之作，从其思想主旨来看，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哲学宿愿——在《资本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基础上写出《辩证法》专著。^③他高度评价了《资本论》历史观的重大哲学意义。他把《资本论》历史观作为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哲学基石，认为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①。他极其生动地指出，在人类社会认识的历史进程中，《资本论》犹如“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象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②。因而，他特别强调，谈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不能仅仅局限于四十年代的专门哲学著作，正是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发挥’，变得更为全面，更为成熟，更为丰富。”

恩格斯是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第一个伟大开拓者，但他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研究课题。在恩格斯以后，留下了两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一，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论战对象，恩格斯侧重于证实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未能对《资本论》逻辑的整体做出全面深入研究，因而较少考虑如何以辩证逻辑的形式构成辩证法规律、范畴的体系。第二，由于相同的原因，恩格斯侧重于简明扼要地阐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这一伟大发现的科学实质，并指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但他并没有把重心放在深入开掘《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丰富内涵，构成完整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

在恩格斯之后的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我们以普列汉诺夫为典型，剖析一下他们在《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研究上的功过得失。

普列汉诺夫主要是从思想广度上向前推进了《资本论》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6页。

同上，第269页。

的哲学探讨的。(1)他指出了《资本论》是研究马克思哲学学说和历史学说的最重要原本。当有些政敌责难马克思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足以说明自己的哲学学说、历史学说时，普列汉诺夫指明，要了解马克思的学说的哲学方面，最重要的材料首推《资本论》。

《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著作 而且也是一本历史研究著作。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 就要读懂“三本最重要的书”，一是十八世纪末以来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二是大家都读过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的《资本论》 三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欧洲事变的历史*。(2)克思学说一反在他之前有的社会科学家单纯从人性出发的立场，首先弄清楚人对自然界发生作用的过程，“当人为着保持自己的生存而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他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普列汉诺夫认为，按其科学的重要性说来，可以大胆地把这个发现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并立。《资本论》作为历史著作是非常精彩的，其中关于历史的理论第一次给了我们理解人类进化的钥匙，是当代最重要的历史理论**。(3)他还首先尝试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总体结构作出哲学概括。他的概括有4种范式：a. 实践观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人作用于自然—改变人自身”。b. 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思想体现为两个归结：生产关系决定着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其他一切关系，生产关系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c. 《资本论》历史观是三个层次的有机体 由里及外为 经济的枯燥的骸骨；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血肉；人类观念、感觉、意图和理想构成的生动诱人的外貌。d. 社会结构五项式：生产力状况；被生产力所制

* 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179页，三联书店1969年版。

**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13页；《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1页，第1卷，第56页，三联书店1969年版。

约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在解决恩格斯遗留下来的两大课题上，普列汉诺夫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理论建树。他在《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上的相互联系的两大缺陷使他在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上比起恩格斯来说甚至有某种倒退：(1)他把主要着眼点放在阐发《资本论》辩证法的个别原理、个别规律、个别实例上，而没有观照《资本论》逻辑的整个体系，没有上升到利用《资本论》来发展作为完整的哲学科学和认识论的辩证法体系。(2)他把思想重心放在通俗地阐明《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个别思想上，而没有提出发展《资本论》历史观，进一步把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的新问题、新任务。由于缺少深刻系统的辩证法作为灵魂，他的唯物史观也就缺少应有的思想锋芒，在一定程度上开了机械论倾向的先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其他战友和学生、第二国际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领域中虽然各有一些独具特色的理论贡献，但大体上没有超越普列汉诺夫的水平，甚至比之还稍逊一筹。狄慈根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最先在工人报刊上为《资本论》发表了书评，认定这是一部巨著，是科学宝库，是最高意义上的科学产物，为打破资产阶级的“沉默阴谋”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格的特点在于充分肯定《资本论》在我们的世纪将成为一部对历史发生最强大影响的著作，并且试图运用《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独立地阐明财产的起源、抽象观念的起源，从而在认识人类历史的某些具体领域中

*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显示出一定的独创性。拉布里奥拉的特点则在于从历史哲学角度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的理论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是到《资本论》中才最终成熟的。这本历史哲学的巨著是丰富、复杂、包罗万象的，从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整个内部结构入手，详尽地研究了这个时期的发生过程，并在思想上超越了这个时期。梅林具有杰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素养，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初步探讨了《资本论》历史观的整体结构，提出《资本论》是“完美的艺术品”、“完整历史观的有机体”。第 1 卷以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二重性为决定点和出发点，在劳动这个社会的深层矿井中探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相当于解剖了社会机体的制造生命汁液的心脏。第 2 卷和第 3 卷则走动在社会的正式舞台上，展示了上述基础之上的各层建筑，说明了整个社会机体直至表皮的血液循环和营养。总起来看，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拓宽了《资本论》历史观的研究广度，但在理论思维的深度上却没有沿着恩格斯开辟的方向继续向前走，而是踟蹰不前，甚至有些倒退。

在理论思维上对《资本论》的研究恢复了恩格斯的高度，并且继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是列宁。列宁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上别开生面，在方法论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 3 个显著特色。

列宁要求从整体高度探讨《资本论》历史观的骨骼和血肉。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早期的历史观著作中。他不仅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而且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著作——既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著作，又是唯物史观的主要著作。他从整体结构高度揭示了《资本论》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思路，在于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作为决定复杂社

会关系的原始关系；而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由此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从系统高度探讨了《资本论》历史观的有机整体：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构成了《资本论》历史观的骨骼“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 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 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① 从而把整个社会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活生生的机体再现出来。列宁特别强调《资本论》中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他指出，马克思整个学说的理论大厦有联系在一起的两块基石：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是辩证方法。正是辩证法的观点贯穿在《资本论》历史观中，才要求把社会看做活动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揭示历史过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自觉因素与自发因素的辩证统一。

列宁要求从系统高度深入研究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资本论》逻辑’。这一研究成果凝聚为列宁中期写成的《哲学笔记》。他要求深入钻研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以便充分利用‘《资本论》逻辑’来完成马克思的哲学宿愿 写出《辩证法》专著。为此 他独具匠心地对‘《资本论》逻辑’和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体结构做了对比研究，索隐发微地研讨了《资本论》逻辑的主线和骨架、细胞和生长机制、出发点和归宿。他还专门探究了《资本论》逻辑构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

列宁要求完整地运用《资本论》的历史观、方法论 创造性地解决 20 世纪实践活动中的时代课题。这一点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列宁后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在早期，他已经运用《资本论》历史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 9 页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观方法论作为认识工具 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逻辑”。而在后期,这一方面日益成为他的活动重心。在第 1 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运用《资本论》逻辑分析所处的时代 写出了《帝国主义论》 揭示了“帝国主义的逻辑”。在十月革命后,他又分析俄国特殊国情,探讨“落后俄国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逻辑”。在最后的“哲学遗嘱”中 他极力强调应该从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其思想主旨在于“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①。这正是列宁哲学探索 30 年的亲身体会和经验之谈。

在上述 3 大领域中 列宁都有超越前人的建树 同时他也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从列宁的思想重心来看,他显然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有直接实践意义的后一方面。因而从列宁所完成的工作进程来看,3 个方面的进展与着手的顺序正好相反。“把《资本论》逻辑和历史观运用于现时代”这一课题最接近于完成,写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和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论著。当然,在列宁生前和身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都不断出现一些尚未解决的新鲜问题。因此,挖掘《资本论》逻辑 写出《辩证法》专著这一课题 是与实践活动有直接联系的认识论问题。列宁留下了 8 本“哲学笔记本”作为一套准备材料 其中包含的 6 个片断性纲要,形成了“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列宁构想”但离真正完成尚有相当距离。所以,上述的课题,着手最早而完成最少,留下的空白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在这方面 列宁的大量思想火花还散见于各种哲学、经济、政治著作中 既没有留下《帝国主义论》那样的专著 也没有留下象《哲学笔记》与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 第 204 页 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样可供加工的雏型，需要后来者沿着列宁指引的方向独立开拓。

第 2 个阶段：列宁时期到 50 年代及 50 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的新趋势。

列宁既是第 1 个阶段的终点，又是第 2 个阶段的起点。他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就是注重《资本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创造性、现实性，力图把《资本论》开创的事业大胆独立地向前推进。这正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不过，他留下的是相当艰巨的任务。高度评价《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努力挖掘《资本论》哲学底蕴，作为制定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理论来源，以克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唯物史观机械论化的倾向——在这个本质之点上，卢卡奇、葛兰西作为列宁的同时代人、战友和学生，同列宁一样站在这个阶段的起点上。问题是他们没有达到列宁同样的高度。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上述意义的尝试，但都存在着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内在矛盾*。

从本世纪 20、30 年代起直到 50 年代中期，出现了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体系化的一系列尝试，可是却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资本论》的巨大哲学意义，以致思想高度从列宁那里陡然下降。这是《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研究中的低潮时期。

在这方面的最初尝试中，20 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 3 本书是：亨·库诺夫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它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出发，磨灭了马克思历史观的革命锋芒，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这是

* 参见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德文 1923 年版；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并参见本书导言的第 4 节。

把马克思历史观加以系统化的最早积极尝试之一，对当时广泛传播唯物史观起了不小作用，在社会心理和文化积累、社会的技术装备和社会的经济结构等问题上有某些独特发挥，它的根本缺陷则是，作者没有充分利用《资本论》的哲学遗产，根本没有考虑按照《资本论》历史观的内在逻辑来叙述马克思历史观，许多地方显露出机械唯物论倾向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影响；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失为把唯物史观系统化的最初尝试之一，并且比较系统，问题是作者完全忽视了《资本论》的哲学内涵，正如他自己承认的：“我的历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在理论上非常不同……从而离开了他们的哲学基础”。

30—50年代，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哲学家中出现了进一步把马克思历史观、辩证法系统化的尝试，可是却忽视了对《资本论》哲学内蕴的深入开掘。在苏联较有影响的有米丁等人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英国著名哲学家康福斯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日本哲学家古在由重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家李达写出了《社会学大纲》。这些著作在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辩证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在把马克思观点系统化方面比20年代有较大进展。可是，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著作在思想深度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在阐述辩证法时，仅仅以恩格斯关于辩证法3个基本规律或斯大林关于辩证法4个特征的思想为框架；在阐述历史观时，则直接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框架，根本没有提出深入挖掘《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的重大任务，没有反映出《资本论》哲学内涵的丰富性。这不免导致把马克思历史观、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

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开

始提出重新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的任务 这一研究又出现了转机和起势。出现了一些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

(1) 对“《资本论》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的研究 是近 30 年来在《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进展最大、成果最丰富的一个领域。苏联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凯德洛夫的 3 部著作。

罗森塔尔于 50 年代中期发表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是几十年来这方面的第 1 部专著,是按照列宁思路来阐发《资本论》哲学意义的第一次尝试。该书的主要缺陷是把着眼点放在《资本论》辩证法的个别问题、个别原理上,而没有注重深入开掘“《资本论》逻辑”的艺术整体。伊里因科夫于 60 年代初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本专著的特色在于把《资本论》看作理论思维的最高级学校,力图从“《资本论》逻辑”中挖掘出马克思“大写字母的逻辑”,从经济学材料中分析出有普遍意义的逻辑因素和逻辑形式;对《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做了多方面的深入考察,揭示了马克思这一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的血缘联系和根本区别。当然,这只是《资本论》逻辑的一个侧面,要达到整个发掘还要走很长的路。凯德洛夫于 80 年代完成的《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构想》是这方面的新的努力。全书第 1 部分试图历史地和逻辑地再现包含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关于“辩证法”专著的伟大构想,表明这一构想的形成与改造黑格尔的关系。从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到凯德洛夫,研究的视角扩大了,更加注重从整体高度探究《资本论》的逻辑结构、逻辑主旨。但许多问题还远未得到完全解决。

在这一方面,苏联学者还写出了 10 多部专著。季普欣的《马

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尼可夫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范畴》、奥鲁杰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瓦久林的《马克思《资本论》逻辑学》、米纳斯扬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塞维夫促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论问题》等。

在这一时期，我国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也都集中在这一领域，如吴传启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章士嵘的《〈资本论〉的逻辑》、李建平的《〈资本论〉辩证法探索》、刘景泉的《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

(2) 对《资本论》历史观的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不过，相比之下这一研究领域还是比较薄弱的。

8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家凯列、普列特尼可夫等人相继提出，应当以《资本论》历史观为典范，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构筑现代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可惜这个任务并没有很好完成。口号与实行之间产生了脱节现象：一些研究《资本论》历史观的著作（如莫斯科大学出版的《〈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斯米尔诺夫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方法》、济哈诺娃等人的《马克思《资本论》对基本的生产关系的系统分析》、А·尤金等人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等）往往仅限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局部研究，没有一本是从整体角度考察《资本论》历史观的；而另外一些着眼于创造历史唯物主义新体系的著作（如凯列、科瓦尔宗的《历史和理论（历史过程理论）》、康斯坦丁诺夫和普列特尼可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过程理论》等）固然有不少有价值的新东西，却缺少对《资本论》历史观艺术整体的深入探讨，因而没有充分系统地利用《资本论》历史观。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近年来在《资本论》历史观研究的

些方面写出了一些有一定深度和系统性的著作。河上肇开创了日本思想注重研究《资本论》历史观的优良传统。他提出,《资本论》是最好的经济原论,但如果不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指导,就根本无法掌握它。为此,他在 1920 年就写了专题论文《见于 资本论 的唯物史观》,后来又相继写出《唯物史观研究》、《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等著作。战后,重视《资本论》及其历史观的哲学意义的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性专著。梯明秀的《 资本论 辩证法的根基》主要着眼于对《资本论》第 1 卷蕴含的历史观做出哲学提炼,全书以劳动过程为中心,依次展开的结构为:物质的哲学概念的具体化——劳动过程的辩证法——人类劳动的资本主义异化——资本发生的辩证法。这方面分量最大、最为详尽的,可能要算林直道 80 年代初发表的两卷本著作《历史唯物论与经济学》了。该书的上卷是《〈资本论 与历史唯物论〉》,下卷是《历史唯物论与异化论》。作者立意通过深入研究《资本论》,使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化、具体化、精密化”。全书的中心是上卷 2 章《 资本论 与人类发展史的理论》,它以人类历史 原始共同体——以资本主义为典型的阶级社会——共同体在更高基础上的复活) 为基本线索,粗线条地概述了《资本论》历史观。此外,镰受教一的《 资本论 体系的方法》则大致按照“价值形态论——生产过程论——生产关系”的思想脉络,试图勾画出《资本论》方法论、历史观的要略。广松涉喜的《 资本论 的哲学》以“价值形态论——物象化论——物种性论”为逻辑框架,对《资本论》历史观做了某些阐发。降旗节雄的《〈资本论〉体系的研究》则以“流通形态论——生产过程论——分配关系论”为线索,再现《资本论》体系。上述种种构想不失为有价值的尝试,但似乎还缺少对《资本论》及其 3 大手稿中的历史观的深刻透视,很难说真正从哲学高度抓住了《资本论》历史观的深层结构。

西方学者也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一些著作。如美国学者 B. 柯洛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威廉·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英国学者 M. 拉德尔的《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G. A. 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D. 塞耶尔的《马克思的方法》（《资本论》中的思想体系、科学和批判）、A. 斯温治伍德的《马克思与当代社会理论》等。就总体来看，这些论著都缺少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整体考察。

我国哲学界中至今还没有发表专门研究《资本论》历史观的专著。但是这个课题已经引起中青年学者的瞩目。景天魁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丁学良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概览》分别论及了《资本论》历史观的两个侧面——劳动学说和人的学说。

（3）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对《资本论》哲学意义的综合比较研究。这是新开辟的一个研究领域，还没有写出专门的著作，只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近年来《资本论》3大手稿的陆续发表，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尝试是 60 年代末民主德国克莱恩等著的《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对《资本论》的手稿及创作各阶段的哲学思想作了粗线条的对比研究；特别是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第 1 手稿的哲学意义，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经典著作”，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包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切合实际地剖析这些问题时，更具有特殊意义”。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注意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没有包含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去的思想。但该书存在着一个尚未解决的内在矛盾：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只包括了《资本论》创作中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但又仍把

《序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经典表述”甚至断言“1859年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范畴的形成过程结束了”^①。这就忽视了从《序言》到《资本论》中马克思历史观的丰富化、具体化、系统化。

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也开始注意阐明《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60年代敦尼克、米丁等人主编的《哲学史》简要地涉及了这一问题。70年代初罗森塔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把思想重心移向《资本论》并且提出“列宁关于《资本论》、关于它对详尽制定辩证方法、辩证逻辑的意义的意义的评价，正是责成我们在叙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时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马克思这一著作上”^②。作者自己意识到了该书的重大缺陷在于，尽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资本论》创作初稿，就其丰富的哲学内容，就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来说，都值得做专题详尽的分析，本节却根本未能提出这一任务。70年代末，纳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约夫丘克主编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试图部分弥补上述空白，把《资本论》创作根据稿本的演化划分为4个阶段，简略地对比研究了每种稿本、每个阶段的不同特色。作者指出，《序言》的思想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展，《资本论》是以《序言》主要思想为基础并发展了这些思想的。作者试图把《资本论》创作的4个阶段作为统一过程，探讨了其中包含的几个范畴系列：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有关的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科学等范畴；与“生产过程”有关的活动与劳动、一般劳动与共同劳动、物化与异化等范畴；与“历史的方向和意义”有关的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人的本

克莱恩等著：《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第400、402、407、4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性、人的全面发展等范畴。问题是 从《序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历史观发展的生长点在哪里 怎样透视《资本论》历史观的范畴体系？这依然是不甚了了的。

（4）对《资本论》哲学思想与现时代的研究，也是一个引起东西方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

日本学者在这一课题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着重指出了《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对分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意义。岗本博之在《〈资本论〉与当代》中 着重从 3 个方面阐明了《资本论》历史观的现实意义：《资本论》阐明的经济范畴和规律是科学地分析 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方法论；《资本论》历史观是指导人们运用辩证法具体分析本国国情的伟大认识工具；《资本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进行分析批判的锐利武器。不破哲三的《〈资本论 与今天的时代》认为《资本论》是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向坂太郎所著的《 资本论 与现代》则着重探讨了马克思异化理论、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在现时代的意义。但是，怎样创造性地系统发展《资本论》历史观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苏联学者则着重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这一课题，阐发了《资本论》历史观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意义。在纪念《资本论》发表 100 周年时 苏联哲学研究所集体编著了一本《 资本论 哲学与现时代》 分别阐发了《资本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思想斗争中的作用，《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在现代科学认识发展中的意义，《资本论》历史观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意义。在后一方面 作者抓住的理论焦点是：生产力发展问题；劳动理论；人的问题；异化范畴等等。至于如何从现代高度系统地挖掘《资本论》历史观，创造性地制定现代历史哲学体系问题，基本上还在作者的哲学视野之外。

《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的百年研究史犹如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资本论》哲学意义的探索走着螺旋形的曲折上升道路 它也告诉我们,《资本论》及其 3 大手稿中的历史观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它还告诉我们,《资本论》及其 3 大手稿的历史观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思想矿山,尚待我们努力开掘。

梅林是最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之一,他对自己和同时代人的《资本论》历史观研究感到很不满足,因而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遗言:“《资本论》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 也正是在历史方面,它好象是一座矿山,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把蕴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件工作将来一定会有人来完成的。”^① 这是一个目光远大的历史预见,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留给后人的重大课题。广泛汲取国内国际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资本论》历史观的哲学探索推向前进,为完成上述重大历史课题做出初步尝试——这正是贯穿本书的思想主旨。

2. 马克思历史观的制高点

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制高点和发达机体在哪里?马克思唯物史观完全成熟并完成了这一伟大发现的最终标志在哪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广泛流行的传统见解中,在我国和苏联等国哲学界的近年研究中,往往把马克思 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当作唯物史观的最为全面的经典论述和最为成熟的发达机体。这种观点典型代表作是苏联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 4—5 页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